

试论《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工农兵中学 驰 文

《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作，成书于战国。这本书总共五千多一点字，分为上下篇，后人称为《道德经》。《老子》思想颇为复杂，但是全书从世界观到社会政治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2页）根据这一教导，下面我们主要就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对《老子》试进行分析。

关于《老子》作者的情况，在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中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在《老子》第二十章中，却恰恰有一段能够表明他政治立场和态度的资料：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儃儃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王弼本，下引《老子》同）

这可以算是《老子》作者的一幅绝妙的自画像。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头几句：“众人”是那样欢欢喜喜，好象参加盛大的筵席，又好象春天登高远望。独有“我”却淡漠地无动于中，颓丧地若无可归。“众人”都有所得，而“我”却若有所失。他究竟失去了什么？他和“众人”的感情为什么那样不同？这只有到当时的时代和阶级斗争中去找原因。

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变革时期。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就是当时社会大变革的高度概括。春秋后期，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公元前550年陈国筑城奴隶暴动，公元前520年“百工”叛变周王室，公元前478年手工业奴隶暴动、围攻卫庄公，等等。旧的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生产关系逐步确立。从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季孙、孟孙、叔孙“三分公室”起，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公元前481年夏，齐国田常用武力打

败以简公为代表的旧势力，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没落奴隶主阶级却江河日下，奴隶制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所谓“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当时剧烈阶级斗争的写照。到了战国，这种斗争更加激烈。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2年楚声王被起义人民杀死，新兴地主阶级推拥熊疑上台，是为楚悼王。公元前385年，秦国公子连在夺权斗争中取得胜利，是为秦献公。至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在几个主要国家基本确立。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变革和反变革，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同时也展开了。

《老子》这本书就正是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产生的。很明显，《老子》反映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下层的思想。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老子》的作者心情十分复杂。对于奴隶主阶级的覆没，他感到惋惜；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他又格格不入。所以当“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时，他却无动于中。“众人”，当主要指新兴地主阶级。老子和“众人”，由于所属的阶级不同，对于这种时代的变革、地位的沉浮，心情是自然不同的。他忧心忡忡，孤独颓丧，“傴僂兮若无所归”。当然无所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的奴隶制崩溃了，作为原来附着在奴隶制这张“皮”上的“毛”，日子确实难过，心情怎么平静得下来呢？“澹兮其若海，颺兮若无止。”就是说，思绪起伏，像海上的波涛，又象疾风一样静不下来。但是，阶级立场毕竟难以转移，他仍然以不合潮流“独异于人”而标榜，并申明他仍然“贵食母”，崇奉他自己的“大道”。

社会的急剧变革在《老子》中还有痕迹：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四十六章）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第五十二章）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第二十六章）

这些话虽然是在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总结教训，但是其中多少也透露了春秋战国的一些社会现实：金玉满堂，谁又保守住了呢；有钱有势，骄横跋扈，到头来反自取灾祸；国与国之间战争频仍，连怀胎的母马也驱上战场；甚至那些奴隶主贵族头子也不能倖免，因为根本动摇而垮台。

《老子》亲身经历了所属阶级的覆没，这无疑给他很大的刺激。在痛苦的反省中，他也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一些原因，并由此总结了一些教训，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表明了他对现实的态度。这些就是《老子》一书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内容。但是，总结教训，提出主张，仍然是为了求得一个“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以改变自己柔弱的地位，其实，这些东西对没落奴隶主阶级是毫无用处的。

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相适应，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出现了一个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学派所进行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作为道家的代表作《老子》，曾经斥责儒家所竭力鼓吹的“仁、义、礼、智”等反动理论。

《老子》中有这样的话：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

在《老子》的作者看来，儒家所大肆吹嘘的“仁、义、礼、智”等货色，并不是那么神圣、美妙、永恒。“大道”被废弃了，“仁义”的喊声才喧嚣一时，所谓“慧智”，里边包藏着严重的虚假；正因为家庭陷于纠纷，才有所谓“孝慈”；正因为国家混乱，才有所谓“忠臣”。因此，什么“仁义”、“慧智”、“孝慈”、“忠臣”，是不足取的。至于“礼”，不仅是最下等、最末流的，而且简直是导致社会混乱的祸首。基于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也就是说，抛弃“圣”和“智”，人民才能得到百倍的利益；抛弃“仁”和“义”，人民才能回复“孝慈”。不难看出，《老子》对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直接地进行了贬斥。

我们知道，所谓“仁、义、礼、智”，乃是孔孟之道的核心。面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局面，孔丘心急如焚，他打起“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挽救没落奴隶主阶级濒于灭亡的命运。到了战国，孟轲继承孔丘的衣钵，竭力宣扬所谓“仁政”和“王道”，以抗拒历史潮流，复辟奴隶制。孔孟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贵族顽固派，他们所宣扬的这一套东西本身就是反动的，并且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就曾严厉斥责孔丘是“鲁国之巧伪人”，说他“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庄子·盗跖》）。早期的法家人物也曾针锋相对地批判过儒家的反动说教。春秋后期郑国的法家人物邓析就“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坚决反对孔丘的复古倒退思想。战国初期的杰出法家人物商鞅，甚至把儒家的“仁义”、“礼乐”、“孝弟”等比喻为“虱”（《商君书·靳令》），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

当然，《老子》的作者和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和法家人物相较，也是不同的。不过，因为他是奴隶主阶级下层中的一分子，对于孔孟所极力宣扬的“仁、义、礼、智”等，也许还比较了解这中间虚伪和欺骗的内幕；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一套

东西并没有能挽救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灭亡，所以他愤愤地贬斥儒家。这种贬斥，就形式上说，和柳下跖以及法家的观点，是较接近的。对新兴地主阶级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客观上还是有利的。列宁说过：“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益于唯物主义的”（列宁《哲学笔记》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9页）。这一教导对我们认识上述问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必须指出，《老子》斥责儒家的“仁、义、礼、智”，乃是从他的“道常无为”的宗旨出发的，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对儒家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把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仍然看作“乱”，看作“无道”；他“绝仁弃义”的目的还是为了“民复孝慈”。他所谓的“民利百倍”，也并不是真的在为老百姓着想。这些都表现出《老子》的局限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我们认为，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代表，如此而已。

三

《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请看下面两段话：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

这两段话中，第二段可以看作是第一段的注释。所谓“无为”，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好静”、“无事”、“无欲”等。据他说，统治者如果照此办理，人民就会“自正”、“自富”、“自朴”。因此就可以“取天下”，因此就“无不为”。这里，《老子》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宗旨。

鲁迅曾指出：“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老子》崇尚“无为”，但这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还是“无不为”，也即是“取天下”。司马迁在《老庄申韩列传》中把老子视为“隐君子”，后世一些人把老子看成“遁世者”，这对老子未免有些冤枉；其实，老子倒是非常想“用世”的。他惋惜奴隶主阶级当权者没有采取这套宗旨，他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但是，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这套宗旨根本行不通。所谓“好静”、“无事”、“无欲”，对奴隶主统治者也仅仅是一句空话。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不管奴隶主阶级是“有为”还是“无为”，都不可能改变其没落和灭亡的命运。对这一点，自然老子是不懂得的。

从“无为而无不为”引申发挥开去，《老子》又提出：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第八十一章）

意思就是说：暂时居后，反而占先；不关心自己，恰恰保全了自己；不是没有私心，表面上没有私心反而能达到个人的目的；正因为不和别人争，反而使任何人都不敢和我争；看起来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有；看起来在给与别人，自己反而获得更多。这些话，与其看作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阐发，倒不如说是恰好暴露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实质。很清楚，这一套东西正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获取私人利益所惯用的手法，《老子》只是加以归纳罢了。后世的剥削阶级之所以看重《老子》，无疑对这一套手法是很欣赏的。

《老子》提出的“无为”的主张和孔孟不同，这是有其阶级根源的。《老子》反映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下层的思想，这个阶层在当时可以说是“弱中之弱”，它既受到人民革命的冲击，又受到上层贵族的排挤、倾轧，甚至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它和奴隶主上层顽固派是有矛盾的。它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固的，力量是弱小的。它无法依靠实力和奴隶主上层贵族竞争。为了保存自己，以图发展，不得不采取这种“屈伸之道”。除此之外，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孔丘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奴隶制虽然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但还没有彻底崩溃。鲁国虽然“三分公室”，但鲁公在名义上还保留着，尽管局面一度不稳。孔丘还乘机混上了司寇，并代理了三个月宰相。齐国虽然建立了封建政权，但楚国、秦国还被奴隶主贵族把持。当时，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相当激烈。所以孔丘还跃跃欲试，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而《老子》成书已是战国中期，封建制在几个主要国家已基本确立。为了巩固政权，许多国家内都进行了一系列变法。这些变法，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老子面对这无可挽回的严峻现实，不得不“以退为进”，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老子》这种思想，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无可奈何的心理和消极对抗的态度。

老子这种思想和他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所谓“道”产生的。“道”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绝对精神。这种观点当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老子认为，“道”之所以生养了万物，就是听其自然，就是“无为”。把这种观点搬到社会实践中，就形成了他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

这种“无为”的思想在《老子》中再三申述，除了向没落阶级表示，没有使用这种神通广大的法宝是怎样的过错外；另一方面，主要地，还是希图新兴地主阶级采纳。很明显，他是想用“无为而无不为”来取代法家的积极有为的路线，以便维持旧秩序，更多地保存旧的东西。

对于法家积极有为的变法革新，老子是不满的。他说：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

意思是说：谁想夺取天下而有所为地去干，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天下”这神秘的东西，是不能靠“有为”去搞的。谁“有为”，谁就要失败；谁想巩固，谁就会丢掉天下。《老子》这几句话并不是信口开河，也是有“来头”的。公元前381年，吴起被杀。公元前338年，商鞅被害。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兴地主阶级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事件都在老子之前或同时，老子不可能不知道，所谓“为者败之”很可能就包括了这些事件。所以他又说：“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这些话虽然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教训的总结和对现实中一些现象的概括，但是这里边已经包含了对法家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威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到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时指出：“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段话用来形容老子是合适的。

《老子》“无为”的主张，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后来的法家人物曾接过这一口号，加以改造，赋予新的阶级内容，用来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比如战国后期法家杰出的代表韩非就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韩非子·主道》）。又说：“（圣人）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韩非子·喻老》）。到了汉初，这种经过法家改造后的“无为”学说就更盛行了。当时汉文帝、晁错等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甚至还披上了“黄老”外衣，搞“无为”政治。当然，历史上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也接受并发挥了这一宗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说：《老子》一书“以为后世阴谋者法”（《馥书·儒道》），是有根据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是鼓吹什么“公私溶化”“吃小亏占大便宜”吗？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是大讲什么“韬晦之计”，主张“忍耐”，说什么“勉从虎穴暂栖身”吗？看来他们对这一套“屈伸之道”很感兴趣，但是无论他们玩弄什么花招，要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然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四

春秋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斗争最终导致了奴隶制的彻底崩溃。这一点在老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子》一书中多处提到“盗”。把人民的反抗和起义称为“盗”，这自然暴露了他的阶级立场，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革命斗争是怎样摇撼着奴隶主的统治，使奴隶主贵族极为紧张、恐惧。

人民为什么原因起义呢？《老子》是这样回答的：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第七十五章）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七十五章）

意思就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统治者征收的租税太重；人民之所以不怕死、敢于造反，是因为统治者拼命追求生活享受。在这里，老子确实是看到了问题的。

随着奴隶制末日的降临，奴隶主贵族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加剧了。据史书上记载，当时齐国的情况就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晋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左传·昭公三年》）。从这个材料可以想见，当时奴隶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怎样的惨重！这种情况在《老子》中也有所反映，比如：

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取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七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贫。（第五十七章）

等等。这些话多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对奴隶主上层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也是一个揭露。老子比较清醒地看到，正是因为奴隶主上层统治者拼命地剥削和无限度地榨取，才遭致了人民的反对。所以他说：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四十四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也。（第四十六章）

他也看到了人民是不怕死的，这是人民无数次的反抗、起义给他的教训。所以他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执而杀之，谁敢？

（第七十四章）

在这里，他表示了不赞成一味用死去威胁人民，因为事实证明了，不管怎样残酷的镇压，都没有能够扑灭革命的烈火，反而更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必须指出，作为没落奴隶主下层的代表，老子不可能超出他的阶级限制。他反对奴隶主上层贵族“食税多”、“求生厚”、“不知足”，并不是要取消剥削，只是想把奴隶主上层贵族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免激起人民的起义。他反对一味用死去威胁奴隶，并不是要放弃武力镇压，只是希望统治者拿出更巧妙的策略，不致于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总之，他这些思想还是从奴隶主下层的地位出发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奴隶制。

还应该看到，《老子》中有关这方面的话虽然是对过去教训的总结，但在战国中期问世，无疑也包含了对当时现实的影射。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话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第五十三章）

译成今文，就是：宫殿整洁，田野荒芜，仓库空虚。（统治者）穿得阔阔气气，佩带宝剑，饱吃精美的饮食，占有多余的财富。这就是强盗头子，多么不合理呀！这里的“盗夸”，很可能指的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因为从全书来看，老子所指的“盗”，都不是奴隶主阶级的人。自然，封建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阶级都是剥削阶级，他们的政权都建筑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基础上。《老子》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揭露虽然有些比较深刻，但他是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从右的方面来揭露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批判英法贵族的话，用在这里是绝妙的：“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至于如何对付人民的起义，《老子》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即是要消患于无形。其具体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主张“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就是说要去掉那些过分的、奢侈的、铺张的欲望和行为。这里，老子也看出了奴隶社会的一些弊病，他希望统治者自动地收敛一下那些过度的享乐。但是，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奴隶主统治者根本没有也不会照他的办；第二，他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这里，如果说前一句对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还有一点暴露的话，后一句把人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为人民看见了引起欲望的东西，就显然不正确了。这说明在关于人民起义的原因方面，老子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仍是模糊的。第三，他主张“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他这里的“巧”和“利”指的什么呢？书中有另外一句：“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第五十七章）。两句话互相参照，可以看出，他这里的“巧”是指的“伎巧”，也就是技术。因此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技术越多，越发达，各种各样“奇物”就涌现出来，这些“奇物”势必引起一些人的凯觞，就会产生“盗贼”，因此，不要“伎巧”，抛弃“奇物”，就“盗贼无有了”。这种看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而且也是复古的、倒退的。第四，老子还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第六十五章）。因此主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第三章）。其实，这就是要采取愚民政策，来瓦解人民的起义。在这一点上，他和孔老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差不多的，这里也恰好暴露出老子的阶级立场。

《老子》还描绘了一张“小国寡民”的社会蓝图。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没有斗争：“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生活上既简单又可观：“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文化上呢，很简单：“结绳而用之”，连文字都不要。人们互不往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样一张社会蓝图并不新鲜，其实是已经消逝了的奴隶社会初期的一张很走样的印刷品，也是“清静无为”的终极目标。他不外向人们表示，如果依照他的办，就可以进入这个“仙山琼阁”。很明显，这样一个“仙山琼阁”是复古的，倒退的。在激烈斗争的社会大变革中，虚构出这样一个幻景，反映了没落奴隶主下层的思想，他们既不满现实，又无能为力，只好凭借往日的回忆和离奇的幻想来求得安慰。

五

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其中有正义的战争，也有非正义的战争。这些战争给人们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同样，也在《老子》中留下了痕迹。

《老子》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这些战争中强弱胜败的变化，总结了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并从中找出了一些规律，有的还上升成为哲学的命题。这中间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

《老子》认识到事物是充满矛盾的。在《老子》一书中提出了几十个对立的观念，比如虚实、强弱、得失、胜败、动静、战守、刚柔、高下、贵贱、祸福、吉凶等等。老子认为这些对立的双方是互相依存的，矛盾的双方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经常地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

就是说灾祸紧靠着幸福，幸福隐藏着灾祸，祸与福这一矛盾经常都在转化。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对《老子》一书中朴素辩证思想的肯定。

从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点出发，《老子》总结出“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对当时社会大变革的高度概括，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曾经是柔弱的地主阶级终于战胜显赫一时的奴隶主阶级，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柔弱胜刚强”是有条件的，这就要“柔弱”的一方必须是新生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刚强”的一方必须是腐朽的、陈旧的、反动的。老子主张“守雌”、“守弱”，以图改变他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

《老子》还提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轻敌必败的战略思想。他说：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第六十九章)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第六十九章)

这种思想是颇有价值的。《老子》还主张：“以奇用兵”，即主张灵活地变换战术。这与儒家的“以礼治军”是对立的，而与孙武的“兵行诡道”、孙臆的“料敌计险”，“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比较接近。《老子》还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九章）。这与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是一脉相通的。这些话至今还有用处。

但是，在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上，老子是不正确的。他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三十章）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三十一章）

看得出来，《老子》对战争，不管是什么性质，基本上是否定的。这实际上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战争的恐惧心理。因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就正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崩溃的，奴隶主阶级的财产也是在战争中失掉的。所以他们一提到战争，精神就格外紧张。与此相反，新兴地主阶级就不同，它在当时是新生的势力，对于同没落阶级进行的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它的态度是坚决的，口号是响亮的。比如商鞅说过：“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韩非更信心百倍地说：“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总之，《老子》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斗争中总结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些东西和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的宗旨是矛盾的，对于他所属的阶级是完全无用的。相反，革命人民和历史上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却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老子》反映的是没落奴隶主下层的思想，这就注定了其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是不行时的。《老子》也曾经为此感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第七十章）。但是，《老子》在后世却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以后不同的阶级、或是同一阶级中不同集团的一些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老子》进行了解释、改造和利用。《老子》的思想至为复杂，这主要是由剧烈变革的时代和作者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老子》进行分析，批判其中唯心的、倒退的糟粕，吸取中间多少合理的东西，弄清这个所谓与儒法“鼎足而三”的道家流派的代表作的内容及其阶级实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的。